

思潮涌动与近代中国

S . C . Y . D . Y . J . D . Z . G

杨晓梅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思潮涌动与近代中国

杨晓梅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思潮涌动与近代中国

SICHAOYONGDONGYUJINDAIZHONGGUO

著 者:杨晓梅

封面设计:翁立涛

责任编辑:谷艳秋

电 话:0431-5649674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130021)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1.875 字数:30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384-4/K·189

版 次:2004年3月第1版

印 次: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定 价:17.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言

早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执教时期，杨晓梅同志是我的学生。她天资聪敏，勤奋向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年后的今天，她将厚厚一摞《思潮涌动与近代中国》的书稿送给我，请我作序。翻阅书稿，我欣喜地发现了她毕业以后奋力攀登的一行行足迹，更回想起了我们在一起互相切磋、教学相长的美好情景。高兴之余，记录下涌来的思绪，以满足晓梅同志的盛情之邀。

思潮实际上是思想潮流的简称，是一个时代某些社会群体、集团、阶层或阶级思想文化变化的反映。民国时期，“思潮”一词即已成为新学人士的时髦用语，并有学者尝试从思潮的视角进行学术研究。梁启超1921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就是这方面的名作之一，只不过由于人们浸迷于其对清代学术源流天才般地论述而不太关注其体例而已。梁启超认为，凡思能成潮者，其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是环境之变迁；二是心理之感召；三是国民思想不期而同趋一方向；四是“‘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五是要有继起之群众运动。合此五者之思想，相与呼应汹涌，“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息”，这样才构成思潮的全过程。此书对清代学术活泼动态的展示，既不同于此前的学案体史书，又不同于此后古板的学术教条，再加上“新民体”直捷明快的“魔力”，出版后在读者中不胫而走，短短11年中先后印行八版。令人遗憾的是，这部书以学术思潮为研究对

象，局于清代汉学一家，我们不能得知作者对社会思潮、文化思潮等影响更为广泛的其他思潮的看法。同时，此书虽以清代学术冠名，但对晚清学术的论述也太过简略。

晚清社会思潮研究相对薄弱的这种状况，在持续了半个世纪后，开始有了较大变化。1991年，著名哲学史家冯契先生主持编写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所收著作以哲学思潮、政治思潮、宗教思潮等专题性研究为主，大大改善了“几近空白”的近代社会思潮研究。1994年，我出版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一书，就近代中国80年社会思潮的开端、主线、流程和终结问题，就思想家群体、国民社会意识与近代社会思潮关系问题等进行了认真研究。这是历史学界较早就这一课题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著作，拙著出版后得到了同仁的厚爱。时隔不久，戚其章、高瑞泉等学者也相继出版了高质量的同名著作。尤其令人欣喜的是，199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吴雁南等四位教授共同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以二百余万字的巨幅就近代中国110年的各种思潮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极有见地的分析，这部著作某种程度上可视为90年代中国近代思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当然，学界在短短10年间出现如此多的高质量作品，并不意味着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已经终结，还有许多老问题和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而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探讨。

首先，中国近代后30年，也就是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社会思潮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过去，我们多把这一段称作中国现代史，主要侧重于国共两党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社会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相当薄弱。近些年来，虽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时段的思想文化问题，但仍略嫌不够。比如，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等三大文化思潮的研究，目前还多局限于对其中一些较具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方面，缺乏对与此相关的环境变迁、国

民心理变动等问题的深入探究，结果，三大思潮研究沦为精英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本应作为反映社会群体形象写真集的思潮研究成为个别人思想的快照。又如对乡村自治思潮的研究，民国时期，这一思潮除其代表人物梁漱溟、阎锡山等之外，还有一大批理论家和实行者，他们共同将理论付诸实践，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乡村自治运动。这一运动几乎持续达 30 年，深入普通民众，深入千家万户，对于今天全国乡村建设和自治改革具有非同寻常的借鉴意义，但在很长时间内，学界对于这一思潮相当冷漠。

其次，伴随理论认识的深入，这一领域将会产生出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新课题。如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国内学者开始认真反思中国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这必然涉及对近代社会思潮的评价问题。如改良思潮，作为与革命思潮相对立的社会思潮，在一段时间内受主流意识形态左右，学界往往以之为批判的对象，而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近些年来，不少学者用现代化理论指导学术研究，认为改良思潮所代表的思想主张虽然在中国走不通，但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许多方面可以避免或弥补革命激进主义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从而开辟出“清末改革思潮”等系列新的研究领域。

其三，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成为近年来强劲的学术增长点，这种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近些年来，人文学科普遍受到社会学与语言学研究的影响，社会学转向与语言学转向已成为人文学者不容回避的问题。既往的社会思潮研究偏重于思想观念的思辨，而疏于相关社会现象的实证，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弥补这种不足。借助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把社会思潮落诸于实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此前社会思潮研究“虚”而不实的状况。语言学对社会思潮同样具有借鉴价值，通过对某一语词能指和所指的分析，借助于对语词产生、流传现象的研究，能够小中见大，看出整个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

正是因为近代社会思潮研究还有多种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或者说这一领域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所以近代社会思潮研究至今仍然盛而不衰。杨晓梅同志所著《思潮涌动与近代中国》就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所形成的一部力作。拜读后,我认为该书至少有这样几个优点或特点。

一是以近代 110 年为研究范围。与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密切相关,此前的同类著作多以前 80 年为研究范围,今天,以 1949 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人们也希望看到一本较为简明的近代 110 年社会思潮研究专著。《思潮涌动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及时地满足了当前教学和科研的需求。

二是脉络清楚,思路清晰。近代社会思潮可谓林林总总,包罗万象,有政治思潮、哲学思潮、文化思潮、宗教思潮等各种类型,每一种思潮下又有支流别派。各种思潮所受影响也是博杂不一,中学西学、新学旧学交织在一起,难以辨认。而各种思潮又往往与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更增加了研究者的难度。作者不畏困难,对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做到了条分缕析。该书从经世思潮到新民主主义思潮依次展开,细而不乱,有条不紊,体现了作者攻克重大课题的研究能力。

三是资料详实,内容丰富。作者广搜博引,所征文献资料达上百种之多,真正做到了立论有据,史论结合。以此为基础,该书内容十分充实,简明而不简单,清晰而不单薄,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全部囊括其中,无一遗漏。

《思潮涌动与近代中国》一书还有更多的优长之处,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了。

我高兴地祝贺杨晓梅同志的大作问世,并真心希望她写出第二部、第三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以供学界同行分享。

胡维革

2004 年 2 月 20 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目录

第一章 经世思潮——近代思潮的勃兴	(1)
1.1 批判社会现实——应对危机的经世思考	(1)
1.2 改革弊端——经世实践的初步尝试	(9)
1.3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经世视野里对西方的初期 反映	(12)
第二章 中体西用思潮——应对“变局”的历史思考	(31)
2.1 “中体西用”的涵义和历史追踪	(31)
2.2 “中体西用”思潮的主要内容	(33)
2.3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41)
2.4 孤独的先行者——洋务理论家郭嵩焘的洋务 思想	(48)
2.5 “中体西用”之完整阐发——张之洞的“中体西用” 思想	(56)
第三章 早期维新思潮——戊戌维新思潮的前奏	(65)
3.1 早期维新思潮的诞生	(65)
3.2 早期维新派及其主张	(67)
3.3 借法以自强——王韬的变法图强思想	(74)
3.4 由洋务而维新——薛福成的洋务思想的发展	(77)
3.5 富强救国——郑观应的维新变法思想	(81)

第四章 救亡呼唤启蒙——维新变法思潮	(90)
4.1 维新变法思潮的发端	(90)
4.2 新颖而庞杂的思想内容	(93)
4.3 融贯中西——康有为与儒家思想近代化	(100)
4.4 从伸民权到新民德——梁启超对改造国民性的探索	(109)
4.5 救亡图存与天演学说——严复的维新变法思想	(120)
4.6 冲决网罗——谭嗣同的《仁学》及其思想	(131)
第五章 顺乎世界之潮流——民主革命思潮	(141)
5.1 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与传播	(141)
5.2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完善	(149)
5.3 改良与革命——章太炎的民主革命思想	(172)
5.4 倾覆满清，描绘共和——邹容的民主革命思想	(180)
5.5 反帝爱国——陈天华的民主革命思想	(187)
5.6 民主革命与妇女解放——秋瑾的妇女解放思想	(191)
第六章 新文化与启蒙运动的高涨——民主科学思潮	(196)
6.1 民主科学思潮兴起之深层动因	(196)
6.2 民主科学思潮的兴起及其内容	(202)
6.3 东西文化的论争	(213)
6.4 德先生和赛先生——陈独秀的民主科学思想	(220)
6.5 只手打孔家店——吴虞对封建礼教的抨击	(226)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的异军突起——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入与传播	(231)
7.1 社会主义思潮的涌来与退去	(231)
7.2 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与传播	(244)
7.3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	(263)

第八章 三民主义的发展与演变——三民主义思潮	(267)
8.1 西山会议派的三民主义	(267)
8.2 国家主义派的三民主义	(272)
8.3 戴季陶主义	(276)
8.4 “改组派”的三民主义	(279)
8.5 第三党的三民主义	(283)
8.6 胡汉民的“训政”三民主义	(289)
8.7 蒋介石的“力行”三民主义	(292)
第九章 改良主义思潮的发展与演化——近代自由主义思潮	(296)
9.1 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演化	(297)
9.2 “联省自治”、“废督裁兵”与“好人政府”政治思潮	(302)
9.3 人权派的思想主张	(317)
9.4 “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	(323)
第十章 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思潮	(331)
10.1 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初步结合	(331)
10.2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342)
10.3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完整体系的确立	(347)
10.4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356)
参考文献及著述	(364)
后记	(369)

第二章

经世思潮——近代思潮的勃兴

本章提要：鸦片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同时也使中国社会思潮发生质的变化。鸦片战争的炮火震醒了沉睡着的大清帝国，在经过坚船利炮与大刀长矛的激烈较量之后，帝国败下阵来，这一失败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封建士大夫集团中出现了一批爱国士绅。鸦片战争前，面对清朝统治的日益危机，他们就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他们十分痛恨鸦片走私。战争中，他们又都是抵抗派。战后，他们为民族屈辱感到苦闷，为民族前途感到担忧。透过弥漫的硝烟，他们终于发觉自己面临的来自西洋的“夷人”是历史上从未碰到过的族类。当中西之间的巨大落差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二千年来传统的夷狄观念动摇了。他们开始寻找自身的问题和弊端，激烈地批判社会现实，要求改革弊政，放眼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一场以关注现实，改变现实为目的的经世思潮迅速兴起，标志着近代思潮的勃兴。

1.1 批判社会现实——应对危机的经世思考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统治衰败的迹象日益显露，清政府的统治几乎有政皆弊。鸦片战争中，江河日下的清王朝又遭到了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的重重一击。这样，在严重的内忧外患面前，一

些不满于清朝腐败统治，要求改变现状的士大夫，已不能安心于从故纸堆中讨生活，他们感到那种以脱离政治为特征的汉学，在封建统治面临危机之际一筹莫展，毫无用处，于是开始抨击汉学，逐渐从训诂考据的圈子中挣脱出来。他们继承清初启蒙思想家把学术研究同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的经世致用学风，为了匡时救世，开始究心时势，倡言改革，批判社会现实，于是一股直面现实的社会思潮便形成了。

鸦片战争前后，一大批社会批判思想家活跃在政治思想舞台上，主要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统治阶级上层之中的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陶澍、黄爵滋等。这类人物对改革派的思想理论虽然也有所创造发挥，但重点在行而不在言，他们往往以地主大吏的身份，利用手中的大权，在可能的范围内积极实践改革，推行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治主张，在水利、漕运、盐法、币制、禁烟等封建大政上有所改革，取得了一些良好政绩，具有较高的声誉，是改革派的政治首脑。另一类则是官卑职小或未登仕途的士大夫，如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这类人物由于手中无权或权力不大，因而往往侧重于言论文章，著书立说，他们以其广博的学说，深刻的思想提出改革理论，并在实践上积极出谋划策，是改革派思想理论方面的重要代表。

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思想所表现的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历史影响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的社会批判思想。社会批判思想家们有的狂言雄论，有的微言细声，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大势、君主制度、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学术学风和对外政策等都进行了冷静的审视和深刻的批判。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被称为开晚清论政风气的“一代宗师”龚自珍。这里我们就以龚自珍为例来分析社会批判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字璩人，号定庵，又名巩祚，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清朝礼部任职，母亲是清朝著名汉学家段玉裁的女儿。龚自珍少

年时代就跟外祖父学习汉学，可谓学有根底，既有家学渊源，又有个人才能，因此可谓前途无量。但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的苦闷，使他放弃了家传的优势，从21岁开始“究心经世之务”，28岁时在北京结识了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一见倾心，表示“从君烧尽鱼虫学，甘做东京卖饼家”。从此师事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并以今文经学为武器抨击时政。38岁中进士，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职长达十年有余，但仕途坎坷。1839年春，因忤其长官，遭到排挤，弃官南下，1841年死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遗著辑有《龚定庵文集》、《龚自珍全集》等。

龚自珍是晚清时期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开创议政新风的前驱者。23岁时写成《明良论》四篇，使段玉裁为之震惊，认为击中“今病”，28岁时学习《公羊春秋》。他是同时代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较早屏弃钻在故纸堆中考证群经，而注重“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即“经世致用”之学的人。他先后写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壬癸之际胎观》、《平均篇》、《农宗》、《己亥杂诗》等诗文，一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儒学传统，以“三寸舌，一枝笔，万言书，万人敌”的大无畏精神，抨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汉学与宋学，揭露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倡言改革，大胆议论天下大事，打破了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氛，有如石破天惊，成为把今文经学引向议政的带头人。

龚自珍之所以能成为开晚清议政风气的一代宗师，是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及个人的际遇相关联的。龚自珍生活于中国的封建已经走向没落、濒临崩溃的时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而西方资本主义已将侵略的触角伸进中国的大门。外患迭至，整个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之中，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引起龚自珍的隐忧与不安，促使他关心“世变”，走上议政的道路。龚自珍出生于书香门第，幼年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他走的科举取仕道路并不顺利。1810年乡试中榜后，两次参加省试未被录取。1819年到1826年五次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

到38岁才中进士，又得不到重用。怀才不遇，使他对清王朝统治者的昏庸相当愤懑。三代京官世家及他本人在内阁任职近10年的经历，使他有条件了解清王朝上层社会腐败黑暗的内幕。严峻的社会现实、个人仕途的坎坷遭遇，使他认识到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统治已是“将萎之华，枯于槁木”。激起他无情地揭露黑暗，指陈时弊的决心。

龚自珍开创勇于议论时政，倡言改革的政治风气，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以后的思想界也产生很大的影响，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年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①高度评价了龚自珍在晚清思想界的地位。

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封建社会危机的无情揭露，是龚自珍政治思想中最突出的部分。

首先，龚自珍无情揭露批判清朝官僚政治的极端黑暗腐败。

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历经两千余年的延续和发展，到了清代，皇权的高度集中已经达到高峰，皇权控制一切，独断一切。到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政治决策、决策实施、信息反馈、官僚任免等方面都已失去了生机和活力，犹如“五官犹存，官窍不能运转”的僵尸。龚自珍以其敏锐的眼光和卓越的胆识予以无情的鞭挞揭露。第一，他批判君主专制造成了“一夫为刚，万夫为柔”。《明良论二》针锋相对地指出：“历观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之存者寡矣……臣节之盛，扫地尽矣。”“主人之遇大臣如遇犬马。”^②在皇帝的专制淫威下，无论是朝廷的封疆大吏，还是府州县官，都是“朝见长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54页，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② 《龚自珍全集》第31—3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跪，夕见长跪”^①，人格受到极大侮辱，怎么还能够有什么廉耻之心？同时，官僚们为了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和保住自己的爵位俸禄，以谄媚为廉正，以逢迎为高招，皇权的淫威造成了官僚的无耻无节。第二，批判君主专制造成了整个官僚队伍“尽奄然而无生气”。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历经两千余年的延续和发展，到了清代，皇权的高度集中已达到高峰，皇帝控制一切，乾纲独断，对臣民万般箝制的结果。鸦片战争之前有清一代确实没有出现过前代权臣跋扈，尾大不掉的局面，但官僚士大夫尽成帝王的仆妾犬马，政治上庸庸碌碌唯唯诺诺，仰帝王鼻息，不仅绝少建树，且形成了一种寡廉鲜耻，阿谀奉承之风。“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②致使整个官僚队伍毫无主体能动性。第三，批判君主专制造成了整个社会人才奇缺。官僚制度的最大弊端是用人论资排辈，即“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一个人从秀才、举人到考取进士走上仕途年过三十，从入翰林再到尚书还需三十到三十五年，再到大学士又得花上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至”，于是资格老的做到宰辅，齿发已老，精神已惫。至于资格嫩的，则“积俸以候时，安静以守格，此士大夫所以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③

其次，龚自珍深刻揭示了清王朝封建统治已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他认为，由于贵族地主，大小官吏贪得无厌地剥削、压迫农民，而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不闻不问，农业生产凋敝。龚自珍指出：“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飧烟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饿以死；……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者不可以

① 《龚自珍全集》，第31页。

② 《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第106页。

③ 《龚自珍全集》，第33—34页。

思潮涌动与近代中国

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加之鸦片烟毒泛滥，弄得国弱民贫，环视九州，四面不撑，虽然清王朝还维持着表面的“太平”、“盛世”，而实际上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如同患了“痹癆之疾”的病人，行将就木了。龚自珍把当时的社会境况形象地比喻为：“日有三时，一曰早时，二曰午时，三曰昏时。”他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大乱将起的衰世。”^②因而他大声疾呼：“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的兵燹。为疫疠，生民唯类，靡有孑遗。”^③因此，他发出了“更法”的主张，“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④他预感到一场社会变革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再次，批判汉学和宋学的空疏无用，指出科举制度的穷途末路。

在清代，汉学和宋学是维护清朝统治的工具，在学术领域内占统治地位。汉学又名考据学，在乾嘉时代曾盛极一时。许多知识分子在清王朝的高压和笼络下，纷纷埋头故纸堆中，“束发就学，皓首穷经”不问世事，穷年累月地一味从事古代典籍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考据学派虽然在整理古籍（“名物训诂”）方面有某些成绩，但却使学术界充塞着十分严重的厚古薄今、脱离现实、烦琐考证的空气。宋学又名理学，也一直得到清朝统治者的提倡，被置于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朱子全书》被广为刊布流行，朱熹的《四书集注》更被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从而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的窒塞空气，并驱使一批封建士子沉湎于程朱理学。

龚自珍把汉学称为鱼虫学。他嘲讽汉学家“琐碎钉”、“繁

① 《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06页

② 《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7页。

③ 《龚自珍全集》，第78页。

④ 同上，第87、88页。

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① 谴责宋学家“坐谈性命，其语喧喧，……何施于家邦？”^②。认为两者都“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③。这种脱离社会实际的学术，对于治国兴邦毫无裨益。他主张面对现实，提倡经世致用，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

对于腐败的科举制度，龚自珍认为是封建社会的一大弊端。到鸦片战争前后，已经走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龚自珍认为科场考试时所写的文章都是“万喙相因”，辗转抄袭，千篇一律。这既使学术界奄然无生气，又耗费人们宝贵的精力时日，还禁锢人们的聪明才智，不仅贻害国家，而且摧残人才，真是毒才害政，贻误非浅。所以科举制度已走到穷途末路。

最后，龚自珍在无情地揭露清朝封建社会腐朽、黑暗的同时，主张实行社会变革，以挽救濒临崩溃的清王朝封建统治。1839年在他辞官南下时写下了一首寄意改革的名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④ 集中反映了他期待社会变革，渴求人材，使国家重新获得生气的迫切心情。他在陈述实行社会变革的必要时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只有不断进行社会变革，才能维持封建主义的统治。同时他还提出要主动积极地进行“自改革”，不要等到群众起来反抗的时候才被迫进行“劲改革”。他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⑤，他还批判了反对改革的封建顽固派，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应当

① 《龚自珍全集》，第195页。

② 同上，第48页。

③ 同上，第114页。

④ 《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21页。

⑤ 《己亥之际著论第七》《龚自珍全集》，第6页。